

母親與子女對過去情緒經驗談話的性別 差異*

王珮玲	邱貞瑜	胡中凡	黃于庭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臺北市石牌國民小學 附設幼兒園	國立成功大學 心理系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

過去經驗充滿著情緒，事件的情緒意義只有在回溯時才會展現，而母親與其子女談話是建構敘說情緒的情境。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究在情緒經驗的談話中，母親對其子女和其子女間情緒用語的差異。研究對象有母子及母女各 20 對，幼兒平均年齡 48 個月，是獨生子女，語文能力無差異。資料蒐集是至家中請親子談論共有的快樂、生氣、難過和害怕情緒，並參考 Fivush 與 Wang 等人的編碼，以 *t* 考驗和卡方分析資料。結果發現，母親對其子女和子女間的情緒語彙量都無差異。再深入探究之，對男孩的快樂情緒，母親會想了解其原因，以提問的方式持續話題，至於男孩的害怕情緒，母親會以澄清及指導言語與之對話。對女孩，母親會以指導方式談論其難過情緒，至於生氣情緒都在談論人際關係。在負向情緒問題方法的提供是無性別差異的。依結果，建議可長期追蹤情緒社會化的歷程，分析情緒語彙的變化及精緻度，探究每對母子和母女情緒用語，關注男女孩的情緒平衡發展，以及應常和幼兒有情緒經驗的對話。

關鍵詞：母子談話、性別差異、過去情緒經驗

情緒發展是幼兒生命的重要環節，而回溯及討論過去情緒經驗不僅會影響其情緒用語的使用 (Dunn, Brown, & Beardsall, 1991; Denham, Zoller, & Couchoud, 1994; Kuebli, Butler, & Fivush, 1995)，情緒能力的發展 (Fivush, 1989; Fivush & Wang, 2005)，與同儕的正向互動 (Halberstadt, Denham, & Dunsmore, 2001)，而且會影響其利社會行為的發展 (Garner, Dunsmore, & Southam-Gerrow, 2008)。但在回溯過去的情緒經驗中，因不同的人經歷相同的情緒事件可能有相異的回憶，雙方之間必須經由語言的討論與協商，才能獲得相互的理解 (Fivush & Nelson, 2006)。所以幼兒必須有能力與另一方互為主體 (inter-subjectivity)，同時將注意力聚焦於相同的對象，與之討論、敘說和協商自我及他人的內在狀態 (Tomasello, 1999)，因此，由有能力的成人與幼兒討論情緒經驗是必要的。在幼兒的生活脈絡中，與幼兒互動最頻繁的對象，也是幼兒情緒的主導者，是其母親 (Zeman, Perry-Parish, & Cassano, 2010)，在談論過去的情緒經驗中，她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 1. 本篇論文通訊作者：王珮玲，通訊方式：peilinwang2001@yahoo.com.tw。

2. 本文係邱貞瑜提臺北市大學幼兒教育學所之碩士論文之小部份內容，在王珮玲教授指導下完成。

對於過去情緒經驗的討論，母親不僅會引導子女回憶對於情緒事件的感受（Fivush & Nelson, 2006），也會協助他們將討論聚焦在重要的情緒經驗上，以更有組織的方式儲存情緒記憶，敘說自己的情緒經驗（Fivush, 1993），並學習該文化脈絡下所重視的情緒事件及價值（Kuebli et al., 1995; Fivush, Berlin, Sales, Menutti-Washburn, & Cassidy, 2003; Fivush & Nelson, 2006）；相對地，幼兒也會模仿母親對於情緒的思考方式，藉以評估自己的情緒，重新詮釋自己對於情緒經驗意義的觀點。換句話說，雙方之間，會藉由言語的談話使情緒事件重新再現，共同反思與詮釋情緒，使情緒有重新被建構的機會。不過，如果親子間並非討論過去的情緒事件，而是直接談論情緒發生的當下時，雙方有可能因為同時處在高度情緒狀態下，思考與判斷會受到這個激烈的情緒狀態所箝制，彼此之間的談話可能會失焦，會以不適當、非理性的反應回應他人或是處理情緒（Fivush, Brotman, Buckner, & Goodman, 2000; Fivush & Wang, 2005）。因為個體從未在當下就能理解情緒，也不可能完整的情緒經驗，唯有個體對情緒事件進行回溯時，它蘊含著的情緒意義才會被拼湊出更完整的樣貌（Fivush, 1993），因此談論過去的情緒經驗是必要的。

在情緒經驗的談話中，母親會藉著與其子女討論情緒相關議題時，協助他們了解無形且抽象的情緒經驗，並解釋情緒的前因後果（Thompson & Meyer, 2007）。不過，令人好奇的是，母親是否會因為其子女的性別差異，而使用不同的情緒用語？至於正處在發展適切詞彙以表達內心情緒的幼兒們，他們的情緒用語是否也會受母親情緒價值觀的影響而有不同，值得深入探究。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二：

- （一）探究母親與其不同性別子女在談論過去情緒經驗時情緒用語的差異。
- （二）探討不同性別幼兒與母親對於談論過去情緒經驗時情緒用語的差異。

一、理論觀點

幼兒情緒發展是一個複雜的辨證過程，其過程並非只是個體單獨內在改變的結果，而是必須透過與社會中的他人互動得以學習。當幼兒與外在社會環境互動時會面臨許多挑戰，除了透過未標準化的肢體語言與臉部表情達到相互溝通的目的外，語言的使用更是關鍵（Vygotsky, 1978）。尤其當母親與其子女在討論過去情緒經驗的互動中，幼兒並非立即經驗這些情緒狀態，而是需要透過語言再現當時的情緒反應，不僅雙方之間能更好地反省和詮釋情緒經驗，而且情緒狀態會被重新建構與呈現，母親會引導幼兒將討論聚焦在重要的情緒經驗上，淡化不重要的情緒。在情緒的談話過程中，母親會使用敘說、討論和協商自我及他人的內在狀態，促使幼兒能深入地建構「過去」和「現在」，「自我」和「他人」的心理表徵（Fivush & Nelson, 2006），並影響他們對於自我、他人及外在世界的看法和覺察（Fivush & Wang, 2005）。就此歷程而言，Fivush 與 Nelson（2006）曾提出，父母與其子女在過去的敘說中，包含內在狀態語言，能幫助幼兒理解自我和他人的心智在時間概念的延續性，提供組織經驗的特別方法，而且敘說的內在語言能預測和解釋人們為什麼那麼做，特別是說明過去與現在的關聯，有助於孩子理解心智的時間性。若親子間的談話愈聚焦在內在狀態，特別是情緒，幼兒能愈早發展其情緒理解能力。就 Vygotsky（1978）的理論觀點，認為語言是種思考機制，是連結個體內在與社會外在的重要橋梁，是與他人互動及溝通的主要工具，更是文化中提供最有力的心智工具，透過語言的媒介，外在經驗會被轉化為內在的理解，使思考更為抽象，不受直接刺激的影響（Bodrova & Leong, 2007）。

母親與其子女在過去情緒經驗談話的心理運作，會轉變為幼兒心理內在的轉換歷程。因為幼兒透過彼此共享活動中建構情緒的意義，意義是父母的意義與其子女推斷母親所指意義的合成物，而且在與母親不斷的互動下，幼兒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建構他個人對於情緒的原始意義，逐漸地，情緒意義會形成文化脈絡中所界定的意義，隨幼兒成長，其對情緒的概念，可能會與成人的概念愈相似。在此過程中，母親會了解幼兒在情緒的近似發展區間（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設身處地的以幼兒為出發點，提供鷹架（scaffolding）協助幼兒以口語組織過去的經驗，建構情緒敘說能力的重要情境，並提昇其能力以達到近似發展區間高層次的心智發展。換句話說，母親會依幼兒當下的情緒理解能力，調整其互動技巧，藉由暗示、重新敘述問題、要求幼兒重述

所聽到的、詢問幼兒問題、詳細解釋或教導等行為，提供更豐富的訊息或是彈性地提供更好的方法讓幼兒能理解情緒觀點，擴展其當下的情緒概念，以幫助他們對情緒的理解能達到更高層次的思考 (Rogoff, 1990)。至於，幼兒的近似發展區間 (ZPD) 也並非靜止不動，它會隨幼兒的思考而改變，每改變一次，他們就學到更多且更複雜的觀念，此過程周而復始的重覆著 (Bodrova & Leong, 2007)，幼兒也逐漸將母親提供的情緒價值觀內化，增進自己的對情緒知識的理解。但在這過程中，母親與其子女必須共有過去的經驗，如此一來，母親才能將其對過去情緒經驗的理解，化為幼兒可理解的方式移轉給他們，在孩子的舊經驗與新情境中搭起一個可以理解的橋梁 (Rogoff, 1986)。唯有透過親子情緒對話，我們才能了解幼兒反省和理解情緒經驗的方式 (Koren-Karie, Oppenheim, Haimovich, & Etzion-Carasso, 2003; Fivush, 1993)，以及幼兒表達與調解情緒經驗的方式 (Fivush & Kuebli, 1997)。例如：幼兒同樣地表達生氣和悲傷情緒，但母親如果傾向和其子女討論悲傷勝於生氣情緒時，子女可能會學到悲傷比生氣的情緒更為重要，在幼兒未來的發展，也比較有能力處理悲傷的情緒 (Fivush, 1993)，在對話中，母親無形地將其對情緒價值觀傳遞給幼兒，影響其情緒社會化的過程。

總之，語言不僅啟發個人心智功能的發展，也是母親與其子女互動及溝通的重要媒介。在對話中，母親不僅提供鷹架途徑，其子女在此歷程下，也能建構彼此敘說情緒的情境。在一來一往的互動過程中，幼兒也學習該文化脈絡下所重視的情緒事件及價值 (Fivush & Buckner, 2003; Fivush & Nelson, 2006; Kuebli et al., 1995)。

二、幼兒情緒與社會化

家庭是幼兒情緒社會化的首要情境，父母是幼兒主要的互動對象，尤其是母親，更是孩子情緒的重要引導者。在與幼兒情感的互動中，不僅幼兒會模仿母親的情緒表達方式，母親對於幼兒情緒表達的教導、增強或忽視，會使他們的情緒逐漸社會化，並學習遵守文化脈絡下的情緒表達規則。但是母親傳遞給幼兒的情緒相關知識，除了反映出自己的信念、家中的情緒表達規則外，更重要的蘊含著社會文化的價值。因此，幼兒在母親的潛移默化之下獲得其文化脈絡下，認為適當的情緒信念後，個體內在認知也逐步調適，並呈現於外在行為的表現，以利自己被社會成員接受，形成良好適應的生活方式。

母親在面對社會要求的情緒規範下，她們會以間接方式，如社會參照、楷模角色或是直接的方式，如教導、情緒討論、情緒行為的偶發事件，使其下一代學習適切的情緒表達與調節 (Brand & Klimes-Dugan, 2010)。不過，母親的情緒教導，與其情緒信念是有關的，例如：母親若認為展現真實的負向情緒會破壞雙方關係，可能導致自己人際關係崩壞，會將情緒視為非理性的，不願意面對情緒的產生，可能會迴避談論，甚至壓抑它；不過，有些母親會有不同的思維與信念，她們可能認為幼兒必須面對負向情緒的存在，因此會接納幼兒負向情緒的表達，並與之討論情緒的相關概念；相對地，幼兒從與母親的互動中學習情緒的表達，也學習回應他人的正負向情緒等等 (Thompson & Meyer, 2007)，以形成情緒的社會化行為。

在雙方互動中，幼兒不僅會受母親個人的情緒信念影響，也會學習到生存所在文化脈絡下的性別角色期待 (Fivush & Wang, 2005; Kennedy Root & Rubin, 2010; Wang, 2001; Zahn-Waxler, 2010)。無論東方或西方文化中，女性常被期待扮演情感性角色，男性則是工具性角色。Fischer 與 Manstead (2000) 也提出西方文化的性別刻板印象是「情緒的女人」，「理性的男人」。依此觀點，與幼兒透過語言共同談論情緒時，母親可能會在無形中將認知系統中根深蒂固的性別角色期待傳遞給幼兒，其子女也會模仿及內化情緒表達，並逐漸表現出符合社會期待的行為。然而依過去研究發現，母親對其子女情緒經驗的談話結果是不一。在情緒詞彙和頻率上，其中有研究發現母親較常與女孩談論情緒 (Adams, Kuebli, Boyle, & Fivush, 1995; Dunn, Bretherton, & Munn, 1987; Fivush et al., 2000; Kuebli et al., 1995; Wang, 2001)，但也有研究發現母親對其子女使用情緒詞彙量是一致的 (Fivush, 1989; Fivush et al., 2000; Fivush & Wang, 2005; Martin & Green, 2005)。至於其子女情緒詞彙使用的性別差異可能在 70 個月後才呈現社會化的現象，70 個月大以前並不明顯，甚至

無差異，如同 Hyde (2005) 研究中，在回顧過去 46 篇有關性別差異的後設分析中，提出性別差異在不同年齡及不同脈絡下具有潛在的變異度，因此對於幼兒情緒語言社會化的現象，在東西方不同文化脈絡氛圍下，可能發生在不同的年齡層，是值得我們深入關注的。

三、母親與其子女在過去情緒經驗談話之相關研究

無論東西方文化，母親在照顧幼兒上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Zahn-Waxler, 2010)，也是主要的情緒引導者，但其情緒用語是否會因子女的性別有所差異，其子女在談話過程中，是否也會受母親情緒價值觀的影響，呈現情緒用語的差異呢？早在 1989 年，Malatesta 等人已指出在嬰兒出生後，母親對女嬰就展現比較多且強烈的臉部表情，即使剛出生不同性別的嬰兒臉部表情是無差異的，但至第一年終了，女嬰開始較男嬰展現更多樣而且更強烈的情緒 (Malatesta, Culver, Tesman, & Shepard, 1989)。此研究指出嬰兒天生的情緒表達是無性別差異，但因照顧者對不同性別的嬰兒有不同的回應，以致影響其情緒表達。在 1987 年，Dunn 等人曾進行兩個小研究，研究一是觀察 43 位在家中排行老二者，在其 18 個月及 24 個月大時，與其母親進行情緒談話，研究二是蒐集 43 位在家中排行老大者，在其 25 個月及 32 個月大時，與其母親和年幼手足的談話，此結果發現女兒在其 18 個月大時，母親就鼓勵她們進行情緒的交流，也常與年長的女兒談論情感，至於在幼兒方面，女孩在 24 個月大時，比男孩較常提及她們情感狀態 (Dunn et al., 1987)。不過，或許受限於幼兒年紀小，情緒詞彙發展有限，未特別探究情緒用語，只關注情緒頻率的探究。

於是，Fivush (1989) 進一步探究情緒詞彙，她讓母親自由地選擇幼兒能記得的情緒事件，探究其與 18 對 30-35 個月幼兒對於情緒經驗的討論。結果發現母親的正負向情緒詞彙不因子女的性別而有異，即使正負向情緒都討論，但母女使用比較多的「難過」詞彙；母子使用比較多的「生氣」詞彙；至於男孩和女孩的情緒詞彙量不僅非常少的，而且也無差異。在 1991 年，Dunn 等人又以過去的研究設計，至家中搜集 41 對 36 個月的幼兒與母親和手足的情感談話的研究，發現結果不同性別子女在情緒詞彙量未有差異 (Dunn et al., 1991)。至於 Kuebli 與 Fivush (1992) 等人則在探究 24 對白人中產階級的父母與其 40 個月幼兒自在地回憶過去共同經歷的三個事件中，發現母親對女兒使用較多，具多樣化的情緒詞彙，也常與她們談論難過的情緒；在幼兒方面，則未發現子女的情緒語彙量有性別差異。

隔三年，Kuebli 等人 (1995) 以類似研究設計，探究 18 對白人中產階級家庭幼兒在 40、58 及 70 個月時與母親談論情緒經驗，結果指出，母親常與女兒討論情緒，尤其是負向情緒，與兒子則是正向情緒；至於幼兒方面，在 40 及 58 個月大時，無性別差異，但至 70 個月大時，女孩明顯比男孩較常以不同方式討論情緒，而且會主動誘發更多的情緒討論。至於 Adams 等人 (1995) 以同樣方法探究 17 對白人中產階級的父母與幼兒在其 40 個月及 70 個月時談論過去的情緒事件，結果發現母親不僅常與女兒談論情緒，使用的情緒詞彙量有變化，常討論難過等情緒；但隨著孩子成長，就較少討論負向情緒；至其子女 70 個月大時，男孩和女孩的情緒詞彙量是差不多，但女孩在獨特情緒詞彙的使用卻高於男孩 (Adams et al., 1995)。上述兩個長期追蹤研究都跨越 2 至 3 個年齡層，除發現母親常與女兒談論情緒，並偏向負向情緒外，更可以看見幼兒在不同年齡層情緒詞彙使用的變化，研究中也指出幼兒約在 70 個月之後，能夠比較明顯看見不同性別幼兒在情緒表達及使用獨特情緒詞彙的差異，似乎在這年齡層之間呈現一逐漸轉變的糾結歷程。

上述多數研究有一共同的現象是，其研究設計都是讓母親自由地談論過去的情緒事件，未限定情緒事件時。不過，此研究設計影響親子雙方在談話時，容易過度集中談論某種特定情緒，不易掌控平均談論所有的情緒，而忽略某些情緒。有鑑於此，Fivush 等人 (2000) 修正過去的研究設計，具體地列出快樂、生氣、難過和害怕等四種過去情緒經驗的事件 (Fivush et al., 2000)，讓親子的談論有所依據，四種情緒都能論及到，但也影響其情緒用語的編碼，其中除情緒詞彙量仍維持原編碼外，其他則刪除正負向情緒的分類，因為三負向及一正向情緒的談論，即可預知負向情緒詞彙量會多於正向情緒，另外，因可預期母親提及的情緒狀態持有者應為幼兒本身，所以情緒狀態持有者修改為對話主題的編碼類型。

於是，依修改的研究設計，Fivush 等人（2000）在探究 21 對 40-45 個月的幼兒與其父母對於情緒的談話，結果發現母親對其不同性別子女的情緒詞彙是差不多的，但仍比較常與女兒談論難過情緒，以及情緒的起因，至於對話主題都聚焦在人際關係；幼兒方面，則未發現男孩和女孩在情緒詞彙有差異，但在談論害怕情緒時，女孩明顯比男孩使用大量情緒詞彙（Fivush et al., 2000）。Wang（2001）探究 22 對美國人與 25 對華人 36 個月幼兒與其母親的情緒的談話，除了依據 Fivush 的研究設計和編碼方式，還增加負向情緒事件的情緒解決方法，她發現兩種文化共有的現象是，母親仍較常與女兒談論情緒，但華人親子間對於生氣情緒有較多的談話，對話主題與人際衝突有關，母親會以重新建立人際關係或是道德教導（moral lesson）的方法，協助幼兒處理生氣情緒的困擾。但由於上述的研究對象大多是 20 多對，研究人數很少，難以解釋和推論至親子情緒用語的相異性，是研究上的限制。

Fivush 等人（2003）的研究對象則有 70 對之多，他嘗試探究 48 個月的幼兒與母親談論生氣、害怕和難過的情緒經驗。結果指出，母親對女兒有較多細節和評價的情緒用語，但未發現母親會特別與女兒談論難過情緒，至於談話的主題上，在生氣情緒上，母女都著重人際關係，而有 1/4 母子談到個人議題，至於害怕情緒，則約有 1/2 的母女著重人際關係，1/2 母子談及個人議題，其中女孩比較怕鬼和怪物，男孩比較怕大聲的噪音；至於難過情緒，男孩談論的多是與父母衝突有關，女孩則是與人際有關（Fivush et al., 2003）。Martin 與 Green（2005）的研究對象也有 50 對之多，他們探究 41 個月大幼兒與父母在四則故事中的談話：（1）父母離開孩子至外旅行過夜、（2）孩子在後院玩跌倒受傷、（3）家裏的狗跑掉了、（4）父母與孩子重逢。未發現母親與其子女在情緒語彙量、獨特的語彙，以及標示、解釋、起因、結果、介入和誘發等情緒類型有差異。不過，此研究的方法受限於具體的故事情節，可能有些情節並非是母親與其子女共有的經驗，幼兒年齡又小，談話內容受限，以致母親對其子女的情緒用語都未有差異。至於 Kennedy Root 與 Rubin（2010）的研究樣本也高達 125 對親子，不過此研究是以問卷探究父母知覺自己對其 44 個月大幼兒的情緒反應，發現母親自己知覺比較會回應女兒的快樂情緒，詢問較多焦慮情緒的訊息。Fivush 與 Wang（2005）在後來的研究，又修改研究方法，以極端的正負向情緒各一，探究 31 對歐裔美國人和 30 對華人母親與其 36 個月幼兒的跨文化情緒經驗對話，結果發現母親與不同性別子女的情緒討論是無差異的，這或許與其極端的正負向情緒研究設計有關，尤其在面對極端的負向情緒，母親都會極欲解決其問題。同一年，Wang 與 Fivush（2005）以相同的設計，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同一群受試者，發現華人母親在正向情緒都強調社交議題，在負向情緒比正向情緒使用較多的「解釋」及「教訓」（didactic）。Zeman 等人探究 60 位母親與其 6-11 歲孩子對於難過和生氣情緒的討論，發現母親對於年長的女孩談論情緒的時間高於男孩，但男孩和女孩討論情緒的時間則無差異（Zeman et al., 2010）。

總之，從上述研究可知，母親對其子女情緒經驗的談話結果不一。在情緒詞彙和頻率上，有研究指出，母親與其子女情緒詞彙量是差不多（Fivush, 1989; Fivush et al., 2000; Fivush & Wang, 2005; Martin & Green, 2005），情緒的討論無差異的（Fivush & Wang, 2005; Zeman et al., 2010）。不過，有研究發現母親常與女孩談論情緒（Adams et al., 1995; Dunn, Bretherton & Munn, 1987; Fivush et al., 2000; Kuebli et al., 1995; Wang, 2001），具多樣情緒詞彙（Adams et al., 1995; Kuebli & Fivush, 1992），母女使用較多難過詞彙；母子則常談到生氣詞彙（Fivush, 1989）。在情緒類型，母親常與女孩討論難過情緒（Adams et al., 1995; Fivush et al., 2000; Kuebli & Fivush, 1992; Kuebli et al., 1995），Fivush 等人（2003）未發現此現象；至於男孩，母親常與其討論正向情緒（Kuebli et al., 1995）。在對話主題上，多是聚焦在人際關係（Fivush et al., 2000; Fivush et al., 2003; Wang, 2001），在解決負向情緒問題上，母親會鼓勵幼兒重新建立人際關係，或是採用道德教導（Wang, 2001），及教訓（Wang & Fivush, 2005）。在男孩和女孩情緒經驗的談話上，幾乎所有研究都認為 70 個月大以前，幼兒的情緒詞彙量是無性別差異（Adams et al., 1995; Dunn et al., 1991; Fivush, 1989; Fivush et al., 2000; Kuebli & Fivush, 1992），不過，對於害怕情緒，女孩比男孩會使用較多的情緒詞彙（Fivush et al., 2000）；在 70 個月大之後，女孩的獨特情緒語彙高於男孩（Adams et al., 1995），常以不同方式討論情緒（Kuebli et al., 1995）。但上述都是西方文化脈絡下的發現，與西方文化氛圍不同的華人社會中，母親與其子女對於情緒談論的差異，是值得重新審視的。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Wang (2001) 提出在討論過去的情緒經驗時, 36 個月的幼兒已能內化母親的回憶方式, Fivush 等人 (2000) 認為 40-45 個月的幼兒能討論過去的情緒經驗, Denham 等人指出 4 至 7 歲的幼兒能理解各種情境會引發不同的情緒, 且能以精確、清晰和複雜的口語反應自己的情緒狀態 (Denham et al., 1994)。依上述學者的觀點, 本研究選擇的對象是介於 42 至 54 個月 ($M = 48.02$) 的幼兒與其母親, 共計 40 對, 包括母子與母女各有 20 對, 高社經母/子有 7 位 (17.5%), 母/女有 6 位 (15%), 中社經母/子有 10 位 (25%), 母/女有 9 位 (22.5%), 低社經母/子有 3 位 (7.5%), 母/女有 5 位 (12.5%)。其中幼兒是家中的獨生子女, 主要原因是比較能夠單純地看見母親與幼兒之間的談話內容, 未有其他手足與幼兒有情感性談話的干擾因素介入影響。至於幼兒的語文能力, 以畢保德圖畫語彙測驗 (陸莉、劉鴻香, 1994) 評估, 位於百分等級 95% 以上, 男生 1 位, 女生 2 位, 位在 90%-95%, 男生 6 位, 女生 8 位, 位在 85%-90%, 男生 7 位, 女生 7 位, 至於在 80%-85%, 男生 5 位, 女生 3 位, 在 80% 以下者, 男生 1 位, 女生 0 位。為不讓細格的期望值小於 5, 合併部分組別, 將百分等級分為「90% 以上」、「85%-90%」以及「85% 以下」三組, 並以卡方考驗檢定, 結果是不同性別幼兒的百分等級無顯著差異 ($\chi^2 = 2.73, p > .05$), 幼兒在語言能力是無性別差異。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由陸莉與劉鴻香 (1998) 修訂自 Lloyd M. Dunn 與 Leota M. Dunn 於 1981 年編製的「修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甲式」版本。此工具是評估 3-12 歲幼兒對聽覺接收與理解詞彙能力, 每題以四幅圖畫呈現在一頁上, 幼兒聽讀詞彙後, 指出其中一幅圖為答案。題本分甲、乙兩個複本, 各有試題 125 題, 測驗的折半信度係數介在 .90 到 .97 之間, 重測信度是 .90。本研究以此測驗的得分高低, 包括原始分數和百分等級, 作為受試幼兒語文能力的指標。

三、資料蒐集過程

研究者先以電話詢問台北市和新北市願意有參與研究的幼兒園, 與園方約定拜訪時間後, 向園長和教師們說明研究目的及需協助之事。在園方回收母親的同意書後, 研究者與母親們約好至家中拜訪。至家中後, 先向母親說明實施流程。此過程是先以「修訂畢保德圖畫語彙測驗」針對幼兒進行一對一評估, 原因是幼兒的口語表達能力可能會影響幼兒與母親談話內容。之後, 再請母親選擇一個安靜的角落, 請母親與幼兒談論過去曾經共同經驗的「快樂」、「難過」、「生氣」和「害怕」等情緒事件。選擇這四種情緒進行研究的原因是: 這四種情緒是不同文化下的成人最能回憶的早年童年經驗 (Wang, 2001), 而且也是嬰兒從出生至一歲間即能發展出的基本情緒, 對幼兒而言, 是共通且熟悉的, 也是家人對話中最常談論的情緒感受 (Bretherton, Fritz, Zahn-Waxler, & Ridgeway, 1986; Dunn et al., 1987; Fivush, 1993)。尤其對於情感表達較為內斂的華人而言, 成人較少與幼兒討論彼此的情緒經驗, 在明確要求親子共同討論曾經共享的快樂、生氣、悲傷與害怕四種情緒, 應能激發更多的討論。

對於情緒事件的選擇, 參考 Wang (2001) 的研究方法, 請母親配合下列事項: 一是避免選擇有故事情節或日常慣例事件, 目的是為了減緩事件本身蘊含著故事情節 (storyline) 而引導著討論內容, 使得親子間的對話僅關注在故事的特定劇情的討論上; 二是事件延續的時間不超過一天, 並且必須是兩個月內發生的事, 目的是確保幼兒仍存有鮮明記憶, 促使親子雙方間的談話能順利

進行，因為太早發生的事件，對於尚未能完整保留記憶的幼兒，可能會降低對話的品質（Wang, 2001）；三是與孩子談論過去四種情緒經驗的時候，必須是兩人共同參與的。

在確認母親很清楚相關的指示，並給予錄音筆，讓她錄下與孩子間的談話。至於快樂、難過、生氣和害怕四種情緒事件的順序，由母親隨機變化，每對幼兒和母親出現情緒事件談話的順序是不一樣的，且對話的開始與結束都由母親自行決定，對話長度沒有特別限制，每種情緒經驗討論也無時間限制。結束後，研究者準備一本繪本作爲幼兒的禮物，以表達感謝之意。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係參考 Fivush、Brotman、Buckner 與 Goodman（2000），以及 Wang（2001）等人的編碼處理母親與其子女的談話資料。資料處理分爲正式編碼前及正式編碼兩階段，如下所述：

（一）正式編碼前階段

1. 區分出四種過去事件對話的開頭、結尾

將親子對話整理成逐字稿後，先指認稿中親子間對於過去事件對話的部分，並標示出情緒敘說的開頭與結尾。當對話者開啓對事件的談論即爲敘說的開頭，至於結束是當對話者停止討論此事件，開始談論另一個經驗，或是變換主題、想像的空談等跳脫原先討論的主題即是。

2. 將每個事件依四種情緒歸類

在對每一個敘說設立明確的界線後，依循敘說對話中的情緒語詞（utterances）分類。將這些敘說片段編碼至四種情緒事件。並計算平均對話時間，其中快樂情緒是母/子 2 分 03 秒，母女 2 分 00 秒，生氣情緒是母子 3 分 6 秒，母女 2 分 32 秒，難過情緒是母子 2 分 43 秒，母女 2 分 59 秒，害怕情緒是母子 2 分 15 秒，母女 1 分 30 秒。

（二）正式編碼階段

將親子對話語料進行處理後，再依據問題予以編碼。首先是從逐字稿中，先計算情緒語彙量，其次再依命題結構可編碼的句子，並依母親和子女的情緒陳述類型分類，最後是談話主題及提供負向情緒解決方法，詳述如下：

1. 計算情緒語彙量

情緒是個體受到某種刺激後所做出的身心激動回應，包括行爲反應的改變（Plutchik, 1982），依其定義及 Fivush 等人（2000）的界定，情緒語彙（emotion words）如下：（1）明白指涉情緒狀態的形容詞用語，如快樂、生氣、難過等，（2）與情緒狀態相關的行爲，如哭泣、尖叫、微笑等，（3）對事物有情緒相關的評價，如「好好玩」的遊樂園；（4）表達情緒的嘆辭，依對話脈絡斷感嘆詞是否爲情緒表現，如母子談到收到禮物的心情，幼兒以「哇~~」來代替情緒語詞的回應（Fivush et al., 2000）。

2. 分析情緒陳述類型

在界定敘說的範圍後，再指認每個情緒相關的命題。一個命題的結構是「主詞+動詞」，如「他跑著離開」；若有兩個相異的動詞，則爲兩個命題，如「他連走帶跑的離開」。每個命題被編爲事件陳述（event talk）與情緒陳述（emotion talk）。其中事件陳述未提到經驗的情緒層面，如「妳在哪部電影中看到貓頭鷹？」不進行分析探究。至於情緒陳述是命題聚焦於經驗中情緒層面的談論，或是與情緒狀態相關，不論是情緒狀態的起因，或是對情緒情境的回應都屬之。而一個命題可以重複編碼，因此「情緒陳述類型」的總量會多於「情緒語彙量」。至於編碼項目是依母親及幼兒的命題分別探究，母親有八項，幼兒有六項，詳如下述：

（1）母親的情緒陳述類型

研究語料參考 Fivush 與 Wang 等人的編碼（Fivush et al., 2000; Wang, 2001），將母親情緒陳述分爲九項，其中有兩項是新增的。新增「覆述」一項，原因是常發現她們會邊重複幼兒的話語，邊思考接續的談論內容。至於「解釋」，分爲「解釋起因」和「解釋結果」，原因是談到情緒起因不見得會談結果。請見下列說明：

- a. 陳述：陳述某人的感受，沒有解釋、澄清或談話後續的相關行爲，例如：我那天很難過。

- b. 解釋起因：能解釋心情的原因，例如：我很生氣是因為你不聽話。
- c. 解釋結果：能解釋心情的結果或行為反應，例如：我難過的時候，就會不想說話。
- d. 問題：提出疑問或開啓對話，例如：你真的那麼生氣嗎？
- e. 覆述：重覆對話者前一句所說的話語，如，幼兒：「我怕小狗咬我啊！」，母親：「你害怕小狗咬你喔！」。
- f. 澄清：澄清對方有誤解之處，例如：我不是生氣，我是擔心你。
- g. 指導：當幼兒有不適切的情緒行為時，母親會試圖改變、導正、阻止他的行為，如，母親：你不可以坐在地上哭，這樣羞羞臉。
- h. 性別角色規範：母親期望幼兒表現出符合其性別角色的情緒，例如：你不能哭，因為你是男生。

(2) 幼兒的情緒陳述類型

本幼兒語料的分析，也是參考 Fivush 與 Wang 等人編碼 (Fivush et al., 2000; Wang, 2001)，將幼兒情緒陳述分為六項。其中刪除未出現的「覆述」和「命名」，也刪除未發生在幼兒身上的情緒陳述。不過，在語料中，發現幼兒常出現許多「嗯」、「喔」、「對」，於是新增「簡短語助詞」。

- a. 陳述：陳述某人的感受，沒有解釋、澄清或談話後續的相關行為，例如：我很開心。
- b. 解釋起因：能解釋心情的原因，例如：我很高興，因為媽媽要帶我去玩！
- c. 解釋結果：能解釋心情的結果或行為反應，例如：我難過的時候，就會不想說話。
- d. 問題：提出疑問或開啓對話，例如：爸爸為什麼不買玩具給我？
- e. 澄清：澄清誤解及多詢問相關資訊，例如：我看到狗狗是會害怕的，不是高興的。
- f. 簡短語助詞：幼兒回應母親僅是簡單的語助詞回應。如母親說：「不可以這樣生氣，要跟別人好好講，知道嗎？」，幼兒回應：「喔！」。

3. 分析談話主題

(1) 個人主題：情緒的起源與幼兒自身經驗有關。例如：幼兒自己把玩具玩壞而生氣。

(2) 人際主題：情緒的起源與幼兒參與社會互動時所引起的，例如：幼兒因為東西被其他小孩搶走而難過。

4. 分析母親提供的負向情緒解決方法

(1) 安心：以口語向幼兒保證，如，「沒事的！」，使幼兒安心。

(2) 與他人重新建立關係：教導幼兒與引起他們負向情緒的他人重新建立和諧關係。例如：他是想跟你玩才拿你東西，你要跟他當好朋友。

(3) 道德教導：藉機教孩子適切的情緒反應，例如：雖然其他小朋友欺負你，你很生氣，但是你也別隨便打人家啊！

(4) 未提供解決方法：母親未提供幼兒任何解決方法，直接結束情緒經驗對話。

5. 生氣事件的編碼分析範例

母：那你最生氣的事情是誰不跟你玩？

(主詞：你最生氣的事情，動詞：是，屬 1 個「命題」。陳述類型是「問題」)

子：洪俊祥不要跟我玩！

(主詞：洪俊祥，動詞：不要，屬於 1 個命題。陳述類型是「解釋起因」)

母：那洪俊祥不要跟你玩，你要怎麼辦？

(主詞：洪俊祥，動詞：不要，屬 1 個命題。陳述類型是「覆述」)

(主詞：你，動詞：要，屬 1 個命題。陳述類型為「問題」)

子：我就自己很開心地玩！

(主詞：我，動詞：玩，屬 1 個命題。陳述類型為：「陳述」)

母：就自己開心的玩喔！可以嗎？還是你希望他可以跟你一起玩？

(主詞：(你)，動詞：玩，屬 1 個命題。陳述類型是「覆述」)

(主詞：(你)，動詞：可以，屬 1 個命題。陳述類型為：「問題」)

(主詞：你；動詞：希望，屬 1 個命題。陳述類型為：「澄清」)

子：我希望他跟我一起玩！

(主詞：我；動詞：希望，屬 1 個命題。陳述類型為：「澄清」)

母：那你要怎麼做，他才不會不要跟你一起玩？

（主詞：你，動詞：要。屬 1 個命題。陳述類型為：「問題」）

（主詞：他，動詞 1：不會，動詞 2：不要。屬 2 個命題。陳述類型為：「問題」）

子：（搖頭）

媽：你不知道？你不要那麼愛哭啊！

（主詞：你；動詞：不知道，屬 1 個命題。陳述類型是「問題」）

（主詞：你；動詞：不要，屬 1 個命題。陳述類型是「指導」）

依上述的生氣事件，首先在語料中找出情緒語彙，出現生氣 1 個、開心 2 個、愛哭 1 個，計有 4 個。之後，再找出母子對話中的命題，並依據命題做陳述類型的分類，陳述類型計有「陳述」1 次，「解釋起因」1 次，「問題」6 次，「覆述」2 次，「澄清」2 次，「指導」1 次。

（三）資料的信度

從 40 份語料中隨機擇取 25%，共計 10 份做為信度檢定的樣本。研究者與另一曾受過幼教所訓練的專業人員建立信度，以積差相關處理，結果是情緒語彙量 .91，情緒陳述類型是 .87，對話主題是 .90，負向情緒解決方法是 .85，總信度為 .89。

五、資料分析

- （一）以 *t* 考驗分析在過去情緒經驗中，母親對不同性別子女在情緒語彙量和情緒陳述類型的差異。
- （二）以卡方考驗分析在過去情緒經驗中，母親對不同性別子女在情緒陳述類型、談話主題及提供情緒解決方法的差異。
- （三）以 *t* 考驗分析在過去情緒經驗中，不同性別子女在情緒語彙量及情緒陳述類型的差異。

研究結果

一、母親對不同性別子女在過去情緒經驗談話的差異

（一）母親對其子女情緒語彙量的差異分析

由表 1 母親與其子女在四種情緒語彙量的平均數可知，在全部語彙上，無論母子或母女，在生氣情緒所使用的語彙都高於其他情緒，此意謂母親對於生氣情緒的重視，或許與華人文化本質希望以和為貴，因此會特別花時間與幼兒談論生氣事件，以致其語彙量比較多。快樂情緒是出現最少的語彙，或許母親認為是正向情緒，不需特別關注。

至於母親的情緒語彙量，無論母子或母女，難過情緒是高於其他情緒，快樂情緒最少。不過，分析情緒表現，從比例 *t* 考驗可知，在快樂 ($t = 1.95, p > .05$)，生氣 ($t = -.85, p > .05$)，難過 ($t = .57, p > .05$) 及害怕 ($t = .05, p > .05$) 等情緒，其比例相當，未有性別差異，意謂母親對其子女情緒語彙量的使用是一致的。

表 1 母親對其子女在情緒語彙量之平均數、標準差、比例與 t 值

組別	全部語彙量		母親情緒語彙量		母親情緒語彙占全部語彙量比例	t (比例)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快樂	母子	171.85	61.88	6.60	4.48	.384	1.90
	母女	150.55	43.53	4.40	1.93	.092	
生氣	母子	219.50	60.51	10.25	5.32	.046	-1.80
	母女	173.30	51.96	11.40	4.68	.066	
難過	母子	201.65	53.88	13.43	5.48	.067	-.56
	母女	173.05	55.65	12.24	7.78	.071	
害怕	母子	191.40	52.70	9.33	6.75	.049	-1.62
	母女	168.45	66.42	9.24	5.10	.055	

(二) 母親對其子女的情緒陳述類型

1. 母親對其子女情緒陳述類型的差異分析

(1) 快樂情緒

由表 2 母親與其子女在快樂情緒陳述類型的平均數可知，母親最常使用「問題」的陳述對子女談論快樂情緒，母親希望延續與他在快樂情緒的話題，以培養其對正向情緒的觀點。不過，母親最少使用「澄清」及「指導」的陳述，其中對於男孩從未使用「澄清」，對女孩未有「指導」的方式。或許與母親認為快樂是正向情緒，不似負向情緒需要再予討論，因此也不需予以澄清或是指導幼兒任何快樂的想法。

不過，分析快樂情緒陳述的表現，從母親情緒語彙占全部語彙量比例的 t 考驗可知，母親常使用陳述 ($t = 2.09, p < .05$)、解釋起因 ($t = 2.07, p < .01$) 和問題 ($t = 2.25, p < .05$) 等三種陳述與男孩討論快樂情緒。意謂母親對於男孩比女孩更重視對快樂情緒的說法，因此談話會常提到與快樂情緒相關的語彙，且提出許多問句來引導解釋男孩快樂情緒的起因，並延展話題持續討論。至於在解釋結果 ($t = .19, p > .05$)、覆述 ($t = -.29, p > .05$)、澄清 ($t = -1.00, p > .05$)、指導 ($t = 1.00, p > .05$) 和性別角色規範 ($t = -1.44, p > .05$) 等五種陳述，則未達顯著差異。

表 2 母親對其子女在快樂情緒陳述類型之平均數、標準差、比例與 t 值

陳述類型	組別	母親情緒陳述類型		母親情緒陳述類型占全部語彙比例	t (比例)
		平均數	標準差		
陳述	母子	2.70	1.95	.016	2.09*
	母女	1.55	.95	.010	
解釋起因	母子	1.65	2.21	.010	2.07*
	母女	.55	.89	.004	
解釋結果	母子	.10	.31	.000	.19
	母女	.05	.22	.000	
問題	母子	9.15	3.58	.053	2.25*
	母女	6.75	4.29	.045	
覆述	母子	1.20	1.61	.007	.29
	母女	.75	.97	.005	
澄清	母子	.00	.00	.000	-1.00
	母女	.05	.22	.000	
指導	母子	.05	.22	.000	1.00
	母女	.00	.00	.000	
性別角色規範	母子	.00	.00	.000	-1.44
	母女	.20	.01	.001	

* $p < .05$

(2) 生氣情緒

由表 3 母親與其子女在生氣情緒陳述類型的平均數可知，無論母子或母女，母親最常使用「問題」的陳述與幼兒談論生氣情緒，男孩高於女孩，最少使用「澄清」的陳述。此意謂在生氣情緒討論中，母親對於男女孩，多會提問，尤其對於男孩，不過，很少使用「澄清」的陳述，以協助幼兒釐清生氣原因及表達。分析生氣情緒的陳述表現，從比例的 t 考驗可知，母親與其子女，在八項陳述都未達顯著差異，可能意謂母親同樣重視男女孩生氣情緒，尤其在華人講究以和為貴的社會中，不希望幼兒破壞人際關係，以致所使用的陳述都未有差異。

表 3 母親對其子女在生氣情緒陳述類型之平均數、標準差、比例與 t 值

陳述 類型	組別	母親情緒陳述類型		母親情緒陳述類型 占全部語彙比例	t (比例)
		平均數	標準差		
陳述	母子	1.98	1.45	.009	-.37
	母女	1.69	.80	.010	
解釋 起因	母子	1.50	1.05	.007	.99
	母女	1.80	1.91	.010	
解釋 結果	母子	1.95	2.33	.009	.003
	母女	1.85	1.66	.011	
問題	母子	14.50	7.50	.067	-1.56
	母女	11.55	3.52	.067	
覆述	母子	1.85	1.87	.011	1.11
	母女	.85	1.47	.005	
澄清	母子	.45	.68	.002	1.28
	母女	.25	.78	.001	
指導	母子	5.30	2.67	.024	.18
	母女	4.00	2.76	.023	
性別 角色 規範	母子	.50	.93	.002	-.83
	母女	.80	.84	.005	

(3) 難過情緒

由表 4 母親與其子女在難過情緒陳述類型的平均數可知，如同快樂與生氣情緒，無論母子或母女，母親也是最常使用「問題」與幼兒談論難過情緒，男孩高於女孩；不過，母親卻很少使用「澄清」的陳述以釐清幼兒在面對難過事件的情緒。無論男孩或是女孩，在感到難過時，母親比較會提出疑問，以了解其難過的可能原因，較少協助其澄清難過的原因。再分析難過情緒陳述類型的表現，從比例的 t 考驗可知，母親會常以「指導」($t = -2.85, p < .05$) 的陳述與女孩談論難過，意謂母親比較在意女孩對難過情緒的調節，因此會指導她如何因應情緒的感受。

表 4 母親對其子女在難過情緒陳述類型之平均數、標準差、比例與 t 值

陳述 類型	組別	母親情緒陳述類型		母親情緒陳述類型占 全部語彙比例	t (比例)
		平均數	標準差		
陳述	母子	2.20	1.19	.011	-1.39
	母女	2.45	1.50	.014	
解釋 起因	母子	2.75	1.58	.014	-.47
	母女	2.20	1.74	.013	
解釋 結果	母子	2.10	1.22	.010	1.38
	母女	2.00	1.51	.011	
問題	母子	12.70	3.88	.063	-1.77
	母女	12.75	4.27	.074	
覆述	母子	1.15	2.45	.006	-.034
	母女	.75	.85	.004	
澄清	母子	.10	.30	.000	-.54
	母女	.10	.44	.000	
指導	母子	2.05	2.36	.010	-2.85**
	母女	4.25	1.47	.025	
性別 角色 規範	母子	.60	.82	.003	1.31
	母女	.20	.52	.001	

** $p < .01$

(4) 害怕情緒

由表 5 母親與其子女在害怕情緒陳述類型的平均數可知，無論母子或母女，母親最常使用「問題」的陳述；此外，母親對男孩最少使用「性別角色規範」的陳述，女孩則是「澄清」。再分析害怕情緒類型的表現，從比例的 t 考驗可知，母親使用「陳述」($t = 1.23, p < .05$)、「澄清」($t = 2.50, p < .05$)和「指導」($t = 2.37, p < .05$)等類型，男孩顯著高於女孩，其他未達差異。意謂母親比較在意男孩對於害怕情緒說詞，希望澄清其害怕心理，並試圖教導處理害怕情緒心理。

表 5 母親對其子女在害怕情緒陳述類型之平均數、標準差、比例與 t 值

陳述 類型	組別	母親情緒陳述類型		母親情緒陳述類型占 全部語彙比例	t (比例)
		平均數	標準差		
陳述	母子	2.45	1.50	.013	.80
	母女	1.80	1.28	.011	
解釋 起因	母子	1.60	1.18	.008	.24
	母女	1.25	.64	.007	
解釋 結果	母子	1.45	2.09	.008	-.36
	母女	1.65	1.90	.010	
問題	母子	11.90	3.55	.062	-1.57
	母女	11.90	5.08	.071	
覆述	母子	2.70	1.66	.014	2.55
	母女	1.10	1.07	.007	
澄清	母子	.35	.48	.002	2.41*
	母女	.05	.22	.000	
指導	母子	3.15	1.73	.016	2.34*
	母女	1.80	1.47	.011	
性別 角色 規範	母子	.10	.31	.000	.33
	母女	.15	.48	.000	

* $p < .05$

2. 母親與其子女的情緒陳述類型交叉分析

由表 6 可知，在情緒經驗談話中，不論母親使用何種陳述，幼兒大多出現「簡單語助詞」，如：「嗯」、「好」、「喔」，有 1428 次（65.00%），男孩有 734 次（51.40%），女孩 694 次（48.60%）。其中母親出現「問題」陳述時，幼兒出現「簡單語助詞」最高，計有 622 次（43.51%），男生 333 次（23.32%），女生 289 次（20.19%）；其次為「指導」，出現 262 次（18.19%），男生有 101 次（7.01%），女生 161 次（11.18%），再其次是「陳述」，出現 174 次（12.07%），最後是「解釋起因」、「解釋結果」、「覆述」、「澄清」和「性別角色規範」。所有類型以「問題」最多，有 1058 次（48.16%），其次是指導。從母親與其子女的交叉對應，「陳述」、「解釋起因」和「解釋結果」相對應的次數較多。

表 6 母親與幼兒談話的情緒陳述類型總數量之交叉表

母親	幼兒		陳述		解釋起因		解釋結果		問題		澄清		簡單語助詞		合計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陳述	40	33	9	6	0	0	1	0	5	2	92	76	264		
	13.51%	11.15%	3.40%	2.27%	0%	0%	100%	0%	11.11%	4.44%	6.59%	5.48%	12.02%		
解釋起因	13	11	48	36	0	0	0	0	2	3	76	63	252		
	4.39%	3.72%	18.11%	13.59%	0%	0%	0%	0%	4.44%	6.67%	5.27%	4.37%	11.47%		
解釋結果	0	0	0	0	31	41	0	0	0	0	74	58	204		
	0%	0%	0%	0%	18.34%	24.26%	0%	0%	0%	0%	5.14%	4.09%	9.29%		
問題	95	99	64	86	32	45	0	0	8	7	333	289	1058		
	32.10%	33.45%	25.67%	33.58%	18.93%	26.63%	0%	0%	17.78%	15.56%	23.32%	20.19%	48.16%		
覆述	3	2	2	2	2	0	0	0	0	0	38	31	80		
	1.01%	0.67%	0.75%	0.75%	1.18%	0%	0%	0%	0%	0%	2.64%	2.15%	3.64%		
澄清	0	0	0	0	0	0	0	0	2	1	5	2	10		
	0%	0%	0%	0%	0%	0%	0%	0%	4.44%	2.23%	0.35%	0.14%	0.46%		
指導	0	0	2	3	8	10	0	0	6	9	101	161	300		
	0%	0%	0.75%	1.13%	4.73%	5.93%	0%	0%	13.33%	20.00%	7.01%	11.18%	13.65%		
性別角色規範	0	0	0	0	0	0	0	0	0	0	15	14	29		
	0%	0%	0%	0%	0%	0%	0%	0%	0%	0%	1.03%	0.97%	1.31%		
分計	151	145	125	133	73	96	1	0	23	22	734	694			
	50.28%	49.18%	48.68%	51.32%	43.18%	56.82%	100%	0%	51.10%	48.90%	51.40%	48.60%			
合計		296		258		169		1		45		1428	2197		

(三) 母親與其子女的對話主題的選擇

由表 7 母親與其子女在情緒主題選擇的次數可知，無論在快樂及害怕情緒上，母親與其子女都傾向討論個人主題，母子高於母女。在生氣和難過情緒上，則傾向討論人際主題，母女高於母子。經卡方檢定，只有在生氣情緒，母女選擇人際主題顯著高於男孩 ($\chi^2 = 4.44, p < .05$)，其他在快樂 ($\chi^2 = .44, p > .05$)、難過 ($\chi^2 = .13, p > .05$) 和害怕等情緒 ($\chi^2 = .14, p > .05$) 是無差異的。換句話說，與男孩相比，在生氣的情緒中，母親常與女孩討論人際主題，至於其他情緒，無論男孩及女孩，在個人及人際主題是無差異的。

表 7 母親與其子女在選擇對話主題之卡方檢定

情緒類別	組別	個人主題	人際主題	χ^2
快樂	母/子	14 (70.00%)	6 (30.00%)	.44
	母/女	12 (61.90%)	8 (38.10%)	
	合計	26 (65.00%)	14 (35.00%)	
生氣	母/子	4 (20.00%)	16 (80.00%)	4.44*
	母/女	0 (0.00%)	20 (100.00%)	
	合計	4 (10.00%)	36 (90.00%)	
難過	母/子	5 (25.00%)	15 (75.00%)	.13
	母/女	4 (20.00%)	16 (80.00%)	
	合計	9 (22.50%)	31 (77.50%)	
害怕	母/子	16 (80.00%)	4 (20.00%)	.14
	母/女	15 (75.00%)	5 (25.00%)	
	合計	31 (77.50%)	9 (22.50%)	

* $p < .05$

(四) 母親對其子女在負向情緒提供的解決方法

由表 8 母親對其子女提供負向情緒解決方法上，四種方法是有顯著差異 ($\chi^2 = 45.56, p < .01$)。在生氣情緒上，提供與他人重新建立關係，有 21 次 (52.50%)，道德教導有 14 次 (35.00%)；難過情緒上，讓幼兒安心有 15 次 (37.50%)，道德教導 12 次 (30.00%)；害怕情緒上，主要提供讓幼兒安心，有 24 次 (60.00%)。再由卡方檢定可知，在生氣 ($\chi^2 = 3.05, p > .05$)、難過 ($\chi^2 = 5.48, p > .05$)、害怕 ($\chi^2 = 2.83, p > .05$) 等負向情緒提供的解決方法，都未達顯著差異。

表 8 母親對其子女在負向情緒提供的解決方法

情緒類別	性別	使幼兒安心	與他人重新建立關係	道德教導	無提供解決方法	χ^2
生氣	母/子	2 (10.00%)	9 (45.00%)	8 (40.00%)	1 (5.00%)	3.05
	母/女	0 (0.00%)	12 (60.00%)	6 (30.00%)	2 (10.00%)	
	合計	2 (5.00%)	21 (52.50%)	14 (35.00%)	3 (7.50%)	
難過	母/子	5 (25.00%)	4 (20.00%)	9 (45.00%)	2 (10.00%)	5.48
	母/女	10 (50.00%)	3 (15.00%)	3 (15.00%)	4 (20.00%)	
	合計	15 (37.50%)	7 (17.50%)	12 (30.00%)	6 (15.00%)	
害怕	母/子	13 (65.00%)	1 (5.00%)	4 (20.00%)	2 (10.00%)	2.83
	母/女	11 (55.00%)	1 (5.00%)	2 (10.00%)	6 (30.00%)	
	合計	24 (60.00%)	2 (5.00%)	6 (15.00%)	8 (20.00%)	

二、不同性別子女與母親在過去情緒經驗對話內容的差異

(一) 不同性別子女與母親在情緒對話語彙量的差異

由表九不同性別子女在四種情緒語彙量的平均數可知，在全部語彙上，男生在快樂情緒出現的語彙最高，女生則是生氣情緒，此意謂男孩常表達正向情緒語彙，女孩是生氣語彙。不過，男孩卻很少出現害怕的情緒語彙，女孩則是快樂情緒。再分析四種情緒語彙的表現，從比例的 t 考驗可知，無論在快樂 ($t = -.72, p > .05$)，生氣 ($t = .54, p > .05$)，難過 ($t = -1.20, p > .05$) 及害怕 ($t = -1.62, p > .05$) 等情緒的語彙，無論男女都沒差異。

表 9 男女生在情緒語彙量之平均數、標準差、比例與 *t* 值

情緒類別	組別	全部語彙量		幼兒情緒語彙量		幼兒情緒語彙占全部語彙比例	<i>t</i> (比例)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快樂	男生	50.00	17.21	1.86	1.49	.037	-.72
	女生	42.55	24.01	1.62	1.69	.038	
生氣	男生	45.45	28.52	2.48	2.77	.055	.54
	女生	43.40	29.90	2.33	2.74	.054	
難過	男生	38.40	19.58	1.71	1.55	.040	-1.20
	女生	35.60	18.00	2.33	2.37	.066	
害怕	男生	45.25	24.15	1.29	1.31	.029	-1.62
	女生	38.30	25.12	1.71	1.55	.045	

(二) 不同性別子女情緒陳述類型的差異

從不同性別子女在四種情緒陳述類型的平均數可知，其中「簡短語助詞」的類型最高。分析情緒的陳述類型的表現，無論在快樂、生氣、難過及害怕等四種情緒，不同性別的子女在陳述、解釋起因、解釋結果、問題、澄清和簡短語助詞等均未達顯著差異。

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本文研究母親與幼兒對過去情緒經驗談話的性別差異，重要的研究結果和與國外相關研究的比較歸納如下：

(一) 母親對其子女和子女間情緒語彙量的差異

1. 母親對其子女的情緒語彙量無差異

本研究發現母親與其子女對於情緒經驗的談論，其情緒語彙量是無性別差異的，此結果回應 Fivush (1989) 等人的研究發現 (Fivush, 1989; Fivush et al., 2000; Fivush & Wang, 2005; Martin & Green, 2005)。形成此結果的原因，推測或許與母親認為幼兒年紀尚小，對於情緒語言的理解有限，因而影響她們對於子女情緒語言的使用，以致無性別差異。當然，也可能與母親不知道如何與幼兒談論情緒有關，因為在資料蒐集過程中，有很多母親反應不知如何與其孩子談論情緒，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幾乎沒有與幼兒談論情緒的習慣。其實，在華人文化脈絡下，情緒的表達就比較為含蓄，在不習慣及不知如何談論情緒的狀態下，可能會影響其對子女情緒語彙的使用。至於另一可能的原因是與本研究對象是獨生子女有關。因為在「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社會期望下，除了彼此間有高度的親密感外，母親會將所有的情感、心力和經濟都投注在孩子身上，更何況家中也無手足與之分享談話的機會，因此無論是男孩，亦或女孩，其所獲得的重視是一致的，因而影響母親對其子女語彙量是無差異的。

雖然母親對其子女情緒語彙的使用是無差異，但從全部語彙中，在生氣情緒中，母親的語彙使用最多。此現象反應母親非常在意幼兒的生氣情緒的表現，希望與之有較多的討論，以協助他們學習適切的情緒表達與調解。Wang (2001) 也曾提到華人文化是特別重視人際和諧的關係，希望不要出現生氣情緒以破壞人際關係，因此特別重視此情緒的處理。此外，整體語彙量中，負向情緒語彙高於正向情緒，這現象也回應 Fivush 與 Wang (2005) 的研究，他們也發現華人比美國人的負向情緒使用較多的語彙，認為華人比較在意幼兒對嫌惡情感的適切情緒表達，而美國人較為傾向與幼兒溝通以及了解其想法。

2. 男女孩之間的情緒語彙量無差異

在談話中，48 個月大的男女孩與其母親的情緒語彙量不僅無性別差異，也偏少量，並且經常以「簡短語助詞」回應母親的問話。雖然過去有些研究提到女性較男性感性，情緒的討論量多且頻繁，敘說較長 (Fivush & Buckner, 2003; Zaman & Fivush, 2011)。不過，以幼兒為研究對象的多數研究已指出 70 個月大以前幼兒的情緒詞彙量是無性別差異 (Adams et al., 1995; Dunn et al., 1991; Fivush, 1989; Fivush et al., 2000; Kuebli & Fivush, 1992)。本研究結果回應過去的發現，形成此現象的可能原因之一是與幼兒年紀小，受限於回憶過去情緒經驗的能力。因為他們並不是立即經驗這些情緒，而是必須重新創造對過去情緒經驗的反應，對 48 個月大的幼兒是有困難及限制的。

至於幼兒對於母親的回應，無論男孩及女孩，在許多時候僅以「簡單語助詞」回應母親的問話，例如：「嗯」、「好」、「喔」，甚至完全沒有回應。可能原因是：在情緒經驗的談話中，母親是情緒的主導者，她會提供情緒經驗的大量的訊息，以致影響幼兒僅能以一兩個字或是簡短的語助詞回應 (Fivush, 1989; Fivush & Fromoff, 1988)。研究也發現母親常以偏向記憶和封閉的問題提問，導致幼兒也僅以簡單語助詞回應。本研究也回應 Wang、Fivush (2005) 與 Fivush (1989) 等人的發現，他們認為在華人社會中，母親在對話中是扮演支配式的角色，她們會主動提出重複記憶式問題，希望延續與幼兒彼此之間的話題，以增進情感，但幼兒或許不習慣情緒的談話方式，以致無太多主動的回應，僅以語助詞回應或者無任何回應。

(二) 母親對其子女和子女間陳述類型的差異

雖然母親對其子女和子女間情緒語彙量未達顯著差異。不過，令人好奇地是當我們進一步深入分析母親與幼兒情緒談話的各種情緒陳述類型時，我們卻有著不一樣地看見，母親會受幼兒性別的影響，使用不同的陳述類型，以強調其所重視的情緒，如下所述：

1. 母親傾向以陳述、解釋起因和問題陳述方式與男孩談論快樂情緒

雖然母親對男女孩使用的情緒語彙量差不多，但在討論快樂情緒時，母親在使用「解釋結果」、「覆述」、「澄清」和「指導」等四種陳述方式，雖無性別差異，但對於男孩會使用「陳述」、「解釋起因」和「問題」陳述方式，其中「問題」陳述方式最常被使用。這意謂母親與男孩在討論快樂情緒時，她傾向以提出許多問題詢問孩子，並引導他們解釋快樂的原因，以利繼續延續快樂情緒的討論，似乎認為是有益於男孩未來的成長與發展。本結果也回應 Wang 等人 (2000) 跨文化的發現，他們指出，無論歐裔美國人和華人母親，在與幼兒回憶過去的事件時，會比較常與男孩延續快樂正向情緒的討論 (Wang, Leichtman, & Davies, 2000)。推測其可能的原因是，東西方文化的價值觀都認為男性未來是要負責重大任的人，期望他們能在幼年早期，培養正向情緒，以期身心健全發展。

從母子的對話中也獲知，母親常主動提出明確的問句，以詢問男孩快樂的原因，也會提出更多的問題以使話題能延續；相對地，與女生的談話，母親提出的問句無法明確判斷是為詢問情緒起因。不過，本結果不同與 Kennedy Root 與 Rubin (2010) 的發現，其研究指出母親知覺自己比較會回應女孩的快樂情緒，可能的原因是與研究設計有關，因為他們讓 125 位父母以情緒問卷評估在面對於幼兒的快樂、焦慮、生氣和沮喪等情緒時，自己的反應為何，是評估父母的知覺，而非親子共同回憶過去的情緒經驗。

2. 母親與其子女談論生氣情緒的陳述類型無性別差異

即使生氣陳述類型無差異，但從其全部語彙量高於其他三種情緒的現象，可知母親非常重視子女的生氣情緒。Wang (2001) 曾提出生氣的確是一特別危險的情緒，需要解決，以維持及促進社會的和諧。Fivush 與 Wang (2005) 也指出，與難過相比，華人比美國人更重視幼兒的生氣情緒，他們曾設計一個讓母親自行選擇情緒經驗的研究中，發現華人母親會主動選擇生氣情緒，而美國母親則選擇難過情緒，此現象或許與東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價值觀有關。在重視集體主義的華人文化中，母親擔心幼兒的生氣表現，會破壞其人際關係，為維持社會的和諧，她們會教導孩子盡量避免出現生氣情緒，以防範有人際衝突的事件發生。更何況，社會的性別刻板印象是期待女生比男孩更具情感技巧，女孩是屬於照顧者的角色 (Brody & Hall, 2000)，期許女孩具有良好情緒表達能力，以化解人際衝突。

從談話過程中，少見母親澄清幼兒的生氣，卻常見她們提出許多問題，使其子女回溯過去生氣的過程，以釐清其為何生氣的原因，並延續彼此之間的話題。例如：「你為什麼生氣？這件事，你為什麼會生那麼大的氣？」，由母親的話語中，或許是受到華人傳統的儒家文化影響，孔子思想強調人際關係的和諧之道（楊國樞，2007），希望以和為貴，而幼兒生氣時所表現的暴躁易怒行為是被視為具破壞性，甚至對人際關係造成威脅，與文化期待展現的行為相差甚遠，因此母親會教導其文化的適當行為。更何況本研究對象都是獨生子女，楊國樞、余安邦（1994）曾指出獨生子女的父母，對於唯一子女的未來，會給予更大期望。國內母親或許是深受文化使命的影響，在面對自己的子女時，都盡力教導他們如何與他人維持良好關係和適切的表現，避免引發不良行為，破壞社會規則。

3. 母親傾向以指導類型與女孩談論難過情緒

難過情緒可能與憂鬱有相關（Fivush & Buckner, 2000），是較為難以解決的情緒，它可能牽涉個人與他人關係的破裂（Stein, Wade, & Liwag, 1996）。本研究發現，母親很少澄清幼兒的難過情緒，但傾向以指導方式與女孩討論難過情緒，也常在情緒當下會拍拍她或是安慰她，因此比較有機會學習處理難過情緒，此結果也回應過去許多研究的發現（Adams et al., 1995; Fivush, 1989; Fivush et al., 2000; Kuebli & Fivush, 1992）。母親會以指導方式協助女孩處理難過情緒之因，或許與女孩比男孩較能以明顯的非語言方式表達其心中不舒服的感受，容易獲取母親的注意及關注，也可能是女孩在日常生活中，表達難過的感受頻率高，所以在談話中，母親會聚焦與女孩討論過去的難過情緒，會提供較多的情緒解決方法及適切的情緒表達方式（Fivush et al., 2000）。

雖然女孩在難過的情緒語彙量與男孩差不多，Conway 等人（1990）曾提出女性對於難過情緒比男性有更深層的反思（Conway, Giannopoulos, & Stiefenhofer, 1990）；或許是女孩與母親的互動中，已學習到難過是重要情緒，以及學習如何處理難過的情緒。至於男孩，母親是以「問題」陳述方法討論難過情緒，但較少指導他們，以致於比較少有機會學習處理難過情緒，尤其從小被教予有淚不輕彈，以致在發展過程中，即使有任何讓他難過的事，也不易顯露出其內心狀態。這或許是影響成年女性較男性更善於表達其難過情緒之因。無論如何，在過去情緒經驗的談話中，無論男孩和女孩都應有機會被指導，以學習處理難過情緒的相關因應策略。

4. 母親傾向以陳述、澄清和指導類型與男孩談論害怕情緒

相較於女孩，國內母親比較會花時間以陳述、澄清和指導方式協助男孩處理其害怕情緒，這或許與母親的性別刻板印象有關，認為男孩要勇敢，不應該害怕任何事物，害怕對男孩是不適切的行為表現（Brody, 1999; Brody, Lovas, & Hay, 1995; Fischer et al., 2000）。從本研究中的語料中可獲知，男孩會主動陳述「怕黑」、「怕狗」、「怕很凶的阿姨」和「怕打雷」等，母親對其反應會感到不可思議及困惑，想要澄清和確認他害怕的起因，也會指導男孩面對害怕情境的調適方式，以協助他學習克服害怕的心理現象。不過，Hudson、Gebelt 與 Haviland（1992）的研究卻反而發現，與本研究相同年齡的 48 個月男孩，比較不容易說出自己的害怕感受，反而女性比較會陳述較多的害怕反應。其實，研究中也發現母親比較能夠接受女孩的害怕情緒，不會詢問，只會給予口語或肢體的安慰，同時在 Fivush 等人（2000）的研究中，她們也發現在討論害怕情緒時，女孩的情緒語彙量會較男孩多，似乎母親較能接受女孩談論較多的害怕經驗（Fivush et al., 2000）。依上述討論，母親對於不同性別的幼兒的研究仍未有一致的結果，有待投入更多研究。

5. 母親最常出現問題類型，幼兒最常出現簡短語助詞

整體而言，在過去情緒經驗的談話中，母親的陳述類型中，最常出現的是「問題」類型，其次為「指導」類型。在「問題」類型上，母親常以提問方式，與幼兒共同回憶情緒經驗，藉由開放式問題，希望得以讓話題能夠持續較久。不過，或許男孩及女孩年紀小，受限於語言表達能力之因，大多出現「嗯」、「好」、「喔」等諸類「簡單語助詞」回應，或是完全沒有回應。這種現象也可能與母親不熟悉情緒經驗的提問有關，在日常生活中，常聽到母親對孩子說：「趕快吃飯」或是「趕快去洗澡」，但較少聽見親子間的情緒對話，這或許是國人在情感的表達上較為含蓄保守，影響母親不知或不熟悉如何使用適切的提問方法，以引導幼兒的回話有關。

至於使用次高的「指導」類型上，反應出母親在幼兒 48 個月大時，會藉由對話過程中，教導其子女正確的情緒表達行為，此現象也回應 Wang 等人的研究，他們認為華人母親不似美國母親比

較會傾向解釋情緒的原因，而是比較會在對話中教導孩子需要表現符合社會規範的適切情緒行為，而且會依據情緒行為給予道德判斷 (Wang, 2001; Wang & Fivush, 2005)。此外，與其他陳述類型相比，母親與其子女在「陳述」、「解釋起因」和「解釋結果」等三種類型相對應的次數較多，或許母親在對話中為幼兒陳述出情緒感受，帶領他們去釐清自己情緒的起因，反思自己情緒的行為反應是否恰當時，幼兒也藉由這樣談話的方式去認識情緒，瞭解自己情緒行為前因後果的關係。也許是因為對話內容由母親所主導，因此也讓幼兒逐漸習得情緒的社會化。

(三) 母親常與女孩討論生氣情緒的人際主題

生氣情緒是一種社會情緒，常來自對於他人語言或行為威脅的反應 (Kring, 2000)，會牽涉人際的問題。本研究發現在生氣情緒的談話中，與男孩相比，母親常會與女孩談論人際關係的議題，並會提供關係維繫，以及道德教導等方法，以與他人維持良好的友誼，避免任何不必要的爭端發生，這似乎隱含著華人文化中重視人與人關係，以和為貴的文化價值觀。研究也回應 Wang (2001) 的跨文化研究，她發現在生氣情緒中，與美國母親相比，華人母親比較會討論人際關係的議題。Wang 等人 (2005) 也再次強調華人文化重視社會和諧及孩子的行為規範，也認為生氣情緒可能會危及人際間的和諧，因此母親會幫助幼兒與他人重建關係及教導正確方法以解決情緒上的困擾 (Wang et al., 2005)。在西方文化中似乎也強調女性的人際關係，例如 Fivush (2010) 曾指出西方女性較男性強調人際關係，Gilligan (1993) 也提出道德成熟的女性較重視關懷他人，而且 Fivush 等人的研究更發現母親與女孩的談話中，約有一半的敘說是針對人際問題，男孩只有三分之一 (Fivush et al., 2000)，此意謂著，母親比較會向女孩談論人際衝突的問題，傳遞其有關的價值觀。

(四) 母親提供子女負向情緒問題解決方法無差異

母親對於幼兒負向情緒解決方法的提供是無性別差異。不過，在生氣情緒上，母親會常提供幼兒與他人重新建立關係的方式，希望與引起其情緒的他人化解衝突，以減少人際上的衝突和問題，回歸華人以和為貴的本質。在難過情緒上，母親大多會採取讓幼兒安心，如提供肢體或口語上的安慰，以穩定其不安的情緒，尤其對於女孩。至於害怕情緒，母親也最常使用讓幼兒安心的方法，以化解其內心的焦慮，使其心情能沉澱下來。此現象是不同於西方母親，他們比較會問孩子情緒的原因，或許與東西方對情緒有不同價值觀有關。

對於幼兒的負向情緒，大多數母親仍會提供幼兒解決方法。尤其近年來，幼兒情緒逐漸被重視，如教育部在幼托整合後將之列為課綱六大領域之一，可見其被重視的程度 (教育部, 2012)。母親也逐漸重視幼兒情緒發展，不再只是一味要求孩子壓抑自己的情緒，會提供方法協助幼兒突破自己內心的困擾，解決其問題。尤其是難過與害怕情緒，其不似生氣情緒般地會牽涉人際的衝突，反而是需要滿足幼兒內心的安全感與穩定感。更何況本研究對象都是獨生子女，母親很重視他們難過與害怕情緒反應，常以口語或抱抱等肢體語言使幼兒安心，至於生氣則教導其人際處理方法，避免衝突發生。

二、限制與建議

在研究中雖發現母親和子女的詞彙量不因性別有異，但重視的情緒有所異。不過，本研究的設計是讓母親與其子女能依據四種具體情緒經驗談論，並非由其自在地談論情緒，對其推論至自然情境是有其限制。而且本研究對象是獨生子女，對於家有手足的幼兒而言，母親對其子女的情緒用語，是否也如研究的發現，在外在效度是有限制的，另本研究對象人數不多，是其限制。不過，本研究是初步探索母親與其子女在情緒經驗談話的差異，依研究發現，對研究及實務，提供下列建議：

(一) 進行長期追蹤深究情緒性別社會化

研究中雖發現母親對不同性別子女的情緒語彙量都沒有差異，以及男女孩之間的語彙量也無差異，至於情緒陳述類型上，不同性別幼兒也未能呈現母親的影響。不過，從 Adams 等人 (1995) 的長期追蹤中，發現雖然男女孩在 40 個月大無差異，未呈現情緒性別的社會化現象，但是，至幼兒 70 個月大時，卻呈現出性別的差異 (Adams et al., 1995)。由於本研究受限於只探究一個年齡層，

但對於男孩及女孩情緒社會化的糾結面向，我們絕不可能由橫斷面的研究可以看見其逐漸轉變的歷程，唯有透過再蒐集幼兒 40 個月後的資料，長期地持續蒐集母親與其子女在過去情緒經驗的談話資料，才能提供具體而更加細膩的資訊，讓我們能更清楚地看見我國幼兒在情緒社會化的全面發展圖像。

(二) 可分析情緒語彙的變化度及精緻度

研究雖初步發現母親對不同性別子女的情緒語彙量無差異，男孩及女孩的語彙量也無差異。然而情緒語彙量是一種數量，數字雖較為客觀，但是有其限制，無法了解其內在的意涵，意即無法辨認男孩及女孩所使用情緒語彙的變化及精緻度。因為雖同屬於情緒語彙，但其所使用的字眼是不同的，精緻度也有差異。建議未來探究類似的研究，可再深入了解分析不同性別幼兒所使用情緒語彙的變化及精緻度的差異，以提供相關研究的參考。

(三) 宜可分析每對母子和母女情緒對話內容

由於本研究是整體地全面分析母親與其子女在過去情緒經驗對話下內容的差異。其優點是能看見整體的現象，但限制是無法一一地了解每對母子及母女的現象是否如同整體所見面向的相似與差異性。未來對於資料的分析，應可以使用更精緻的方法處理每對母子與母女的對話資料，或許對於其情緒對話資料會有不同的看見與發現。

(四) 宜可探究母親與非獨生子女的情緒談話

東西方文化都認為女性是比男性更擅於表達情緒，自我敘說比較長 (Bauer, Stennes, & Haight, 2003)，但本研究未有此發現。可能與研究只單純地探究母親與獨生子女間的情感談話有關，因無其他手足與之分享和母親的情緒經驗談話，母親的情感和時間都投注在這位孩子身上。或許家中有其他兄弟姐妹的存在，母親與不同性別幼兒的情感談話可能會有差異。建議未來研究，可深入探究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與母親的談話，可能會再看見不一樣的研究結果。

(五) 應平衡關注女孩和男孩正負向情緒的社會化機制

從結果可知，母親會想了解男孩快樂的原因，會提問以持續話題，至於害怕情緒，會以澄清及指導言語與之對話，但對於女孩，母親是以指導方法談論其難過情緒，於是男孩和女孩分別學會這些情緒的重要性，影響其在未來情緒的理解和表達，也漸形成其情感的性別區隔 (sex segregation)。例如：母親若以指導方式與女孩談論難過情緒，女孩除了學會因應悲傷難過情緒的方法外，也學習如何以精緻及精確的語彙描述自我的感受。對於少有會機會談論難過情緒的男孩，在未來發展中，他可能會忽略或不知如何處理自己的難過情緒。尤其在傳統以男性為主的父權社會文化下，認為男性應陽剛且有淚不輕彈的氛圍下，這種現象又被強化。事實上，無論男孩或女孩都會有各種正負向情緒，在幼兒成長過程中，母親宜應隨時提醒自己，盡可能降低固有的刻板性別角色印象，應能平衡關注女孩和男孩正負向情緒發展的社會化機制，讓男孩和女孩在學習各種情緒的表達、調節及解決都有同等的學習機會，使其未來情緒得以健全發展。

(六) 母親應學習及習慣於情緒的表達

研究過程中，大多數母親反應平常不僅很少和幼兒談論情緒，也不知道如何和孩子談論情緒。這種現象可能和華人的文化有關係。《中國人的素質》一書指出中國人是能「忍」的民族，可以長期不抱怨、不生氣、沒有不滿情緒。這種默默承受的「忍」功，推崇「喜怒不形於色」的修為，也反映出個人常為社會關係的緣故，選擇壓抑自己的情緒，亦不擅於情緒表達 (秦悅譯, 2001)。而母親的情緒表達對於幼兒具有示範作用，影響幼兒瞭解和解釋他人情緒的能力。本研究發現平均 48 個月幼兒多半以「簡單語助詞」回應，反應出幼兒與母親談論情緒經驗的機會少，也不習慣情緒的談話。這種現象也提醒母親學習表達情緒以及與幼兒談論情緒的重要性，若母親可以常與幼兒談論情緒經驗，幼兒也必能學習如何更多地表達和理解情緒 (Kuebli et al., 1995)，有益其情緒能力的發展。

參考文獻

- 陸莉、劉鴻香（1994）：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台北：心理。[Lu, L., & Liu, H. Z. (1994). *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 Taipei, Taiwan: Psychology.]
- 教育部（2012）：幼兒園教保課程活動暫行大綱。台北：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2).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Taipei, Taiw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 楊國樞（2007）：華人性格與人際互動。台北：心理。[Yang, K. S. (2007). *Personality and interaction of Chinese*. Taipei, Taiwan: Psychology.]
- 楊國樞、余安邦（1994）：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文化、教化及病理篇。台北：桂冠。[Yang, K. S., & Yu, A. B. (1994). *Psychology & behavior of Chinese-culture, civilization, pathology*. Taipei, Taiwan: Guei Guan.]
- 秦悅譯（2001）：中國人的素質。上海：學林。Smith, A. H. (1894).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ondon, England: Kegan.
- Adams, S., Kuebli, J., Boyle, P. A., & Fivush, R. (1995).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past emotions: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Sex Roles, 33*(5/6), 309-323.
- Bauer, P., Stennes, L., & Haight, J. (2003).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ner self in autobiography: Women's and men's use of internal states language in personal narratives. *Memory, 11*(1), 27-42.
- Brand, A. E., & Klimes-Dugan, B. (2010). Emotion socialization in adolescence: The roles of mothers and fathers. In A. Kennedy Root, & S. Denham (Eds.),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28*, 85-100.
- Bretherton, I., Fritz, J., Zahn - Waxler, C., & Ridgeway, D. (1986). Learning to talk about emotions: A 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 *Child Development, 57*, 529-548.
- Brody, L. R. (1999). Gender and emotion. In D. Levinson, J. J., Ponzetti, Jr., & P. F. Jorgensen (Eds.), *Encyclopedia of human emotions* (pp. 287-293). New York, NY: Macmillan.
- Brody, L. R., & Hall, J. (2000). Gender, emotion, and expression. In M. Lewis, & J. Haviland-Jones (Eds.), *Handbook of emotions* (pp. 338-349). New York, NY: Guilford.
- Brody, L. R., Lovas, G. S., & Hay, D. H. (1995). Gender differences in anger and fear as a function of situational context. *Sex Role, 32*(1/2), 47-78.
- Bodrova, E. & Leong, D. J., (2007). *Tools of the mind : The Vygotskian approach 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2nd ed.). Columbus, OH: Merrill/Prentice Hall.
- Buckner, J. P., & Fivush, R. (2000). Gendered themes in family reminiscing. *Memory, 8*, 401-412.
- Conway, M., Giannopoulos, C., & Stiefenhofer, K., (1990). Response styles to sadness are related to and role orientation. *Sex Roles, 22*, 579-587.

- Denham, S. A., Zoller, D., & Couchoud, E. A. (1994). Socialization of preschoolers' emotion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0*, 928-936.
- Dunn, J., Bretherton, I., & Munn, P. (1987). Conversations about feeling states between mothers and their young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3*(1), 132-139.
- Dunn, J., Brown, J., & Beardsall, L. (1991). Family talk about feelings states and children's later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emotio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7*(3), 448-455.
- Fischer, A. H., & Manstead, A. S. R. (2000). The relation between gender emotions in different culture. In A. H. Fischer (Ed.), *Gender and emotion: Soci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pp. 71-94).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vush, R. (1989). Exploring sex differences in the emotional content of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past. *Sex Roles, 20* (11/12), 675-691.
- Fivush, R. (1993). *Emotional content of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past*. In Charles, A. N. (ed), *Memory and affect in development-The Minnesota Symposium on Child Psychology, 26*. Hillsdale, NJ: Erlbaum.
- Fivush, R. (2010). The development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2*(2), 2-24.
- Fivush, R., Berlin, L. J., Sales, J. M., Menutti-Washburn, J., & Cassidy, J. (2003). Functions of parent-child reminiscing about emotionally negative events. *Memory, 11*(2), 179-192.
- Fivush, R., Brotman, M. A., Buckner, J. P., & Goodman, S. H. (2000).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child emotion narratives. *Sex Roles, 42*(3/4), 233-253.
- Fivush, R., & Buckner, J. P. (2000). Gender, sadness, and depression: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focus through gendered discourse. In A. H. Fischer (ed.), *Gender and emotion: Soci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pp. 232-253).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vush, R., & Buckner, J. P. (2003). Creating gender and identity through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 In R. Fivush, & C. A. Haden (Ed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rrative self* (pp. 149-167).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Fivush, R., & Fromoff, F. A. (1988). Style and structure in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 about the past. *Discourse Processes, 11*, 337-355.
- Fivush, R., & Kuebli, J. (1997). Making everyday events emotional: The construal of emotion in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past. In N. Stein, P. A. Ornstein, C. A. Brainerd, & B. Tversky (Eds.), *Memory for everyday and emotional events* (pp. 239-266). Hillsdale, NJ: Erlbaum.
- Fivush, R., & Nelson, K. (2006). Parent-child reminiscing locates the self in the past.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4*, 235-251.

- Fivush, R., & Wang, Q. (2005). Emotion talk in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of the shared past: The effects of culture, gender, and event valence.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 6*(4), 489-506.
- Garner, P. W., Dunsmore, J. C., & Southam-Gerrow, M. (2008).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emotions: Linkages to child aggress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Social Development, 17*(2), 259-277.
- Gilligan, C. (1993).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lberstadt, A. G., Denham, S. A., & Dunsmore, J. (2001). Affective social competence. *Social Development, 10*, 79-119.
- Hudson, J. A., Geblt, J., & Haviland, J. (1992). Emotion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in young children's personal accounts.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2*, 129-150.
- Hyde, J. S. (2005). The gender similarities hypothes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0*(6), 581-592.
- Kennedy Root, A., & Rubin, K. H. (2010). Gender and parents' reactions to children's emotion during the preschool years.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28*, 51-64.
- Koren-Karie, N., Oppenheim, D., Haimovich, Z., & Etzion-Carasso, A. (2003). Dialogues of seven-year-olds with their mothers about emotional events: Development of a typology. In R. N. Emde, D. P. Wolf, & D. Oppenheim (Eds.), *Revealing the inner worlds of young children: The MacArthur Story Stem battery and parent-child narratives* (pp. 338-354).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ring, A. M. (2000). Gender and anger. In A. H. Fischer (Ed.), *Gender and emotion: Soci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pp. 211-231).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uebli, J., Butler, S., & Fivush, R. (1995). Mother-child talk about past emotions: Relations of maternal language and child gender over time. *Cognition and Emotion, 9*(2/3), 265-283.
- Kuebli, J., & Fivush, R. (1992).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past emotions. *Sex Roles, 27*(11/12), 683-698.
- Malatesta, C. Z., Culver, C., Tesman, J. R., & Shepard, B. (1989).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during the first two years of lif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rtin, R. M., & Green, J. A. (2005). The use of emotion explanations by mothers: Relation to preschoolers' gender and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s. *Social Development, 14*(2), 229-249.
- Plutchik, R. (1982). A psychoevolutionary theory of emotion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1*, 529-553.
- Rogoff, B. (1986). Adult assistance of children's learning. In T. E. Raphael (Ed.), *The context of school-based literacy*.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 Rogoff, B. (1990). *Apprenticeship in thinking: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social context*.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in, N. L., Wade, E., & Liwag, M. D. (1996).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and remembering emotional events. In N. L. Stein, P. A. Ornstein, B. Tversky, & C. A. Brainerd (Eds.), *Memory for everyday and emotional events* (pp. 15-47).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Thompson, R. A., & Meyer, S. (2007).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family. In J. J. Gross. (Ed), *Handbook of emotion regulation* (pp.249-268).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Tomasello, M. (1999).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human cogni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Q. (2001). "Did you have fun?" American and Chinese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shared emotional experiences. *Cognitive Development, 16*, 693-715.
- Wang, Q., Leichtman, M. D., & Davies, K. I. (2000). Sharing memories and telling stories: American and Chinese mothers and their 3-year-olds. *Memory, 8*(3), 159-177.
- Wang, Q., & Fivush, R. (2005).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of emotionally salient events: Exploring the functions of emotional reminiscing in European-American and Chinese families. *Social Development, 14*(3), 473-495.
- Zahn-Waxler, C. (2010).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Who influences whom and how?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28*, 101-109.
- Zaman, W., & Fivush, R. (2011). When my mom was a little girl. . . :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s' intergenerational and personal storie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1*(3), 703-716.
- Zeman, J., Perry-Parish, C., & Cassano, M. (2010). Parent-child discussions of anger and sadness: The importance of parent and child gender during middle childhood.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28*, 65-83.

收稿日期：2013年11月12日
一稿修訂日期：2014年03月24日
二稿修訂日期：2014年05月07日
三稿修訂日期：2014年06月03日
四稿修訂日期：2014年06月13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4年06月13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5, 46(3), 377-400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Gender Differences in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Past Emotions

Pei-Ling, Wang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aipei

Chen-Yu Chiu

Taipei Municipal Shipai Elementary School

Jon-Fan, Hu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Yu-Ting Hua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aipei

The emotional meaning of previous experienced events emerges from retrospection.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are contexts in which emotional narratives are built and where children acquire emotional values or meanings. In this study explored gender differences for emotional words that mothers and their 48-month-old (averaged) children used to communicate regarding past experiences. Participants included 20 mother-son dyads and 20 mother-daughter dyads. Data were collected during home visits on conversations of shared previous events between mothers and their only child on four specific emotion experiences: happiness, anger, sadness, and fea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amount of the emotional words used between mothers and boys or mothers and girls in the conversations. Additionally, with sons, mothers tended to talk about happy experiences through questioning, but fearful experiences through clarifying and guiding manners. In contrast, with daughters, mothers were found to frequently use guiding manners to discuss sad experiences. Across genders,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on words used to talk about regulating negative emot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we propose longitudinal monitoring of the socialization processes of emotion development, then analyzing the variation and elaboration of emotional word use between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order to equate the emo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boys and girls and encourage conversations involving emotional experiences.

KEY WORDS: gender differences,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 past emotion